

#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马忠新 陶一桃

**摘要：**基于对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布的考察，本文研究了中国各地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当今各城市的人均 GDP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人均 GDP 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市场化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新时代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更好的发挥企业家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 一、引言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激发、传承、保护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探究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经济绩效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家精神一直是主流经济学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坎蒂隆、萨伊、马歇尔、奈特、熊彼特、科斯等学者都曾论及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内涵，近些年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行为理论、资本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欧雪银，2009）。西方经济学者近些年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代表性的有 Audretsch & Keilbach（2004）在企业家资本与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输出之间建立联系，解释了创业资本的含义及其影响经济产出的机制，并基于德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资本对产出的显著影响。Samila & Sorenson（2011）基于 1993-2002 年美国大都会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风险资本、企业家精神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Decker et al（2014）基于对具体行业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近些年美国企业家开办公司的激励逐渐下降，对美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动力产生显著影响。Tsvetkova（2015）基于 2001-2005 年美国大都会地区科技专业服务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专利发明、企业家精神与公司创造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Glaeser et al（2015）以“距煤矿的距离”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了美国各地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此外，戴维·兰德斯等（2010）使用历史研究方法探究企业家精神及其经济绩效，以克服现有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和障碍。

国内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宏观研究方向主要关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庄子银（2003）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精神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李宏彬（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经济绩效；胡永刚、石崇（2016）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配置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陈逢文等（2018）基于 31 个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微观领域的相关研究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陈忠卫、李晶（2005）把微观领域的企业家精神研究称为“内部企业家精神”，并对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

\*马忠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8061，电子邮箱：[52870975@qq.com](mailto:52870975@qq.com)；陶一桃，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2018）”（编号：16ZDA003）资助。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李新春等（2006）基于 125 家民营家族企业和 452 家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进而影响公司绩效；蒋春燕、赵曙明（2006）基于中国江苏和广东两省的 676 家新兴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通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的经济绩效；刘鹏程等（2013）从创业动机视角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

梳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研究文献发现，国外与国内文献的研究方法明显不同。国外文献主要使用实证方法论证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性，如：Andersson & Koster（2011）基于瑞士各地的企业创办数据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具有时空的持续性和路径依赖特征，现期的企业创办率与过去的企业创办率存在显著的响应机制；Wyrwich（2012）实证研究了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各地的企业家精神传承，结果表明，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家精神“残余”显著影响市场经济改革后的创业活动；Stuetzer et al（2015）基于 19 世纪英国煤矿分布的研究认为，当今各地的企业家精神水平与历史上受煤矿分布影响的企业家精神传承密切相关。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则侧重于理论阐述，如：徐静等（2016）、高波（2007）等文献都阐述了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传承性。

从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结果来看，虽然有较多的文献关注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但鲜见涉及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此外，目前国内的研究文献也很少涉及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实证检验。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基于对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布的考察，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机制，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文化传承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从创新、创业、市场化的视角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绩效的内在机理，并引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历史溯源、传承机理与理论假说，包括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脉络，企业家精神传承的内在机理，以及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经济绩效及其影响机制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变量指标和计量模型，包括变量指标的构建说明，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以及计量模型的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的结果与分析，包括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经济绩效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以及稳健性的阐述和检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建议。

## 二、历史溯源、传承机理与理论假说

### （一）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脉络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封建农业社会，无论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义利观，还是关于“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划分，都体现了长期以来社会对商业活动的文化偏见和对商人态度的冷漠，但商业活动和商人的作用在历史文献中也不乏被着墨。《管子》把自利作为说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这些记载体现了古代商人冒险、坚韧的企业家精神。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两个朝代，尤其是宋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戴维·兰德斯等（2010）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在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国内市场和区域贸易的繁荣，中国社会和伦理准则出现理性化趋势，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宋代甚至形成了一种“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还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吴晓亮，2003）。宋代不仅“大众创业”的社会氛围浓郁，而且还涌现出大量代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技术创新，除了众所周知的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之外，还有滑轮轴、闸门、拱桥等基础设施技术，以及支撑了繁荣纸币经济的“交子”等金融技术。唐宋时期的商业文化和创新创业氛围

促进了中国古代企业家精神的成长。

明清商帮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国内贸易繁荣和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促进了手工业作坊工厂的进一步成熟,同时,商号经营和家族治理的制度创新也大量出现,如:被称为股票期权雏形的“顶身股”制度就是晋商在长期经营实践中的一种制度创新。清朝建立后延续了明末对商人阶层的自由放任政策,尽管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已非常高,各种书面合同的应用和官府裁定执行使企业家的活动获得了更有力的制度支持,行会组织的大量出现使企业家成为一个更为社会认可的独立社会阶层和群体。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晚清开始重视工商业,甚至被学界称为“重商主义”浪潮(冯筱才,2003),这一时期的商人群体呈现多元化,包括本土商人、“洋商”、官商,以及学习西方技术和管理之后回国创办新式企业的商人等,商人社会地位的显著质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企业家阶层在社会巨大动荡和变革中逐步确立了与“官员”接近的尊崇地位。瞿秋白在《乱弹·代序》指出:“中国现在,只有所谓绅商,才配叫做市民。”晚清形成的所谓“绅商”阶层将“绅”与“商”并列,基本结束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划分。

纵观两千多年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薪火相传,尽管身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轻商、抑商”的制度文化之中,但他们和熊彼特、鲍莫尔等学者所描述的企业家精神并无差别,不仅具有一度领先世界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不但是技术领域的发明,也包括企业治理制度的创新;而且具有冒险、坚韧的创业精神。

## (二) 中国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内在机理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当今的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机理,可以概括为三个路径:

一是具有代际传承特征的家族老字号企业是企业家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华老字号企业是以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企业家精神在耳濡目染的家族经商实践中和家庭教育中进行代际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家族企业的传承不仅是财富和权力的传承,更重要的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李新春等(2008)基于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也表明,家族企业通过战略创业行为等方式实现创业精神传承与跨代际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家精神传承重要载体的家族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空间稳定性,这也决定了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代际传承,各地的企业家精神也因此受到历史上当地企业家精神的显著影响。

二是企业家精神随着社会营商文化的历史传承而传承。社会营商文化是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土壤,全社会对企业家及其经商活动的认知态度、价值判断等文化观念,对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和成长至关重要,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阐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宗教伦理文化。戴维·兰德斯等(2010)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进指出:文化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生命力和特征有着强大影响,这种文化即包括宗教文化,也包括世俗文化;即包括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文化,也包括抑制创新创业的文化。高波(2007)的研究也指出,中国各地的企业家精神是以价值观体系扩展和创新为核心的文化资本积累,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差异与文化差异相关,城市文化是影响和引导企业家价值观体系扩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三是企业家精神伴随营商制度的“路径依赖”而传承。营商制度体系是企业家精神传承的制度基础,营商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至关重要,显著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配置(魏下海等,2015)。诺思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进入某条路径,由于报酬递增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锁入”这条路径,很难逆转。各地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营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历史上营商制度环境优质的地区具有更好的企业家精神,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营商制度表现出跨期的稳定性,赖以发育和成长的企业家精神也会随之而传承下来;相反,坏的营商制度也会同样产生路径依赖,历史上企业家精神比较弱的地区也很难培育出优秀的企业家精神。

#### （四）企业家精神传承的经济绩效及其影响机制的假说

**假说 1：**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会显著影响地区的经济绩效，且这种影响以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为中介。

理解这一中介作用首先需要探究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具有“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能力；鲍莫尔把企业家定义为能够敏锐洞察机会而主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以增加自身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这些活动常常是设计创办和创建一家新企业，并把企业家分为创新型企业家和复制型企业家，同时进一步指出复制性创业和增长之间相关性较少或不存在（邢源源，2017）。科斯、柯兹纳、舒尔茨、卡森等西方学者对企业家的论述虽角度不同，但内涵上也主要涉及熊彼特与鲍莫尔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归纳而言，创新和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基于此，并根据上文关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分析和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绩效的研究文献，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2：**市场化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制度质量更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反之，则影响更小。

从经济事实比较来看，历史上企业家精神更强的城市如江、浙、粤、闽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也有些历史上企业家精神强大的地区，如：晋商、徽商发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突出。这说明，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焕发”与“衰微”与某种因素密切相关。Baumol（1990）认为，不同的制度，即不同“收益社会结构”决定了创业人才在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中的配置，而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配置，促进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茁壮成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产保护等制度因素。制度在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调节作用的假设也得到了程锐（2016）等国内实证文献结论的支持。因而，本文提出有关市场化具有调节效应的假说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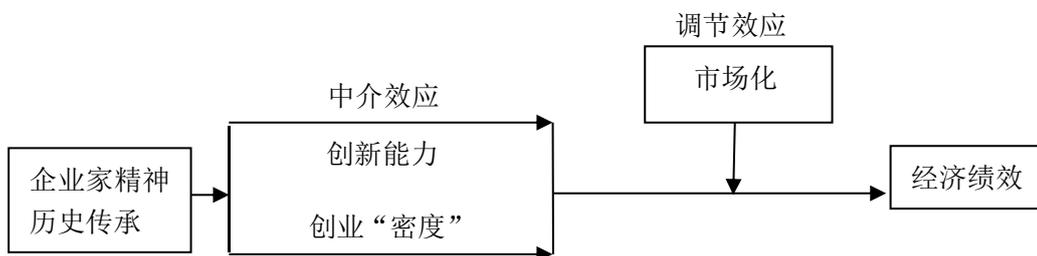


图 1：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 三、变量指标与计量模型

####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分别以地市级以上城市样本和省级样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参考 Acemoglu et al（2001）等经典文献，具体使用人均 GDP 为量化指标，尽管中国 GDP 数据的统计可能存在偏差，但在大多数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中仍被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常指标选择，如：方颖、赵扬（2011），董志强等（2012）。此外，本文所研究的是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城市为例，改革开放之初（1979 年）除去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的人均 GDP 超过 1000 元，其余均在 500 元左右，差距较小，以当今（2010-2016 年）的人均 GDP 代表各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绩效是合适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水分”问题所带来的短期人均 GDP 偏误的影响。城市样本与省级样本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7）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7）。

2. 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最终以历史上的企业为载体呈现出来，流传至今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集中体现了历史上各地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差异，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现实“标本”。本文以各地的每万人拥有的中华老字号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量化指标，具体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商务部公布的《中华老字号名录》，各城市的中华老字号数量按照这些企业的发源地城市分类整理获得，同样的方法获得省级中华老字号数量。

3. 中介变量：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基于第二部分有关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通过影响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因而，本文以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作为中介变量，创新能力使用人均专利申请量表示；创业“密度”使用人均创业企业数量，根据鲍莫尔关于创业企业的分类，创业包括复制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而真正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的是创新型创业，因而，本文的创业“密度”使用人均创新性创业企业数量，具体使用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上市的企业数量，相比使用开办企业总数，该指标更能客观的捕获创业“密度”的内涵信息，具体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4. 调节变量：市场化进程。市场化进程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重要指标，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制度的调节作用。具体指标选择如下：对于省级层面的研究，本文使用王小鲁团队所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市场化进程总指数评分”，该报告研究了 2010-2014 年中 31 个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共有 155 个样本值；在以地市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检验中，基于城市层级数据的可得性，参考樊纲等（2011）、韦倩等（2014）等研究文献，本文选取私营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作为各个城市市场化的量化指标，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7）。

5. 控制变量。资本、劳动（收入决定因素）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豪尔和琼斯所谓的社会基础结构。参考相关研究文献中有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以及 Acemoglu et al（2001）、方颖等（2011）、董志强等（2012）等经典文献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以地理纬度、距海岸的距离、交通基础、自然资源等社会基础结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地理纬度以城市所处的地理纬度值表示；距海港距离以与最近海岸的直线距离表示；交通基础采用道路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表示；自然资源以是否属于“资源型城市”构建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区域虚拟控制变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四大区域设置三个虚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控制变量的设置按照 2010-2016 的年份数据差别设置 6 个虚拟控制变量。

表 1 变量指标选择及其含义

	变量指标	简称符号	变量含义
因变量	人均 GDP	<i>Pcgdp</i>	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比值
自变量	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	<i>China_brand</i>	各城市中华老字号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
中介变量	人均创业企业	<i>Enterpri</i>	各城市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企业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

	人均专利申请	<i>Innovate</i>	各城市专利申请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
调节变量	市场化进程	<i>Market</i>	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所占的人员比重
控制变量	地理纬度	<i>Latitude</i>	城市市中心的纬度值
	距海岸距离	<i>Ocean</i>	城市市中心与最近海岸的距离
	自然资源	<i>Resource</i>	是否属于国务院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
	道路密度	<i>Transport</i>	城市道路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
	区域虚拟变量	<i>Space dummy</i>	按照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的划分设置三个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i>Year dummy</i>	按照 7 年的年份跨度设置 6 个虚拟变量

## （二）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指标的统计性特征。本文研究的对象包括 280 个城市样本<sup>1</sup>和 31 个省级样本。其中，城市样本组考察了 2010-2016 年共 1960 个观测值，省级样本组考察了 2010-2016 年共 155 个观测值。城市人均 GDP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21.549 和 0.530（单位：万元），标准差为 2.845；省级人均 GDP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1.820 和 1.323（单位：万元），标准差为 2.228，省级样本的经济发展差异略低于城市样本；整体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此外，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人均创业企业、人均专利申请、市场化等变量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些统计特征为本文的回归分析提供了可能。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较为直观的呈现了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显示：人均创业企业、人均专利申请和市场化指标均与人均 GDP 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6、0.684 和 0.603，这种显著的正相关特征与理论预期相符，初步判断：作为中介变量的人均创业企业和人均专

<sup>1</sup>地市级城市 278 个，副省级城市 15 个，直辖市 4 个，共 297 个，剔除哈密、吐鲁番、昌都、林芝、山南、菊芦岛、毕节、儋州、海东、拉萨、普洱、日喀则、三亚、汕头、铜仁等 17 个数据不完整的城市，余 280 个城市样本。

利申请，以及作为调节变量的市场化可能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此外，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与中介变量（人均创业企业和人均专利申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44 和 0.459，说明人均创业企业、人均专利申请可能会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中发挥中介作用。表 3 还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各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较低，这表明我们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这些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符号方向也符合经济理论的预判。

表 2：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城市样本变量					
简称符号	min	max	mean	std	N
<i>Pcgdp</i>	0.530	21.549	4.545	2.845	1960
<i>China_brand</i>	0.000	7.980	0.578	0.917	1960
<i>Enterpri</i>	0.000	0.590	0.027	0.056	1960
<i>Innovate</i>	0.080	195.750	11.747	18.749	1960
<i>Market</i>	0.000	0.835	0.114	0.081	1960
<i>Latitude</i>	20.020	50.140	32.843	6.613	1960
<i>Ocean</i>	1.100	2796.800	484.072	426.220	1960
<i>Resource</i>	0.000	1.000	0.404	0.491	1960
<i>Transport</i>	0.087	6304.471	42.051	233.612	1960
省级样本变量					
简称符号	min	max	mean	std	N
<i>Pcgdp</i>	1.323	11.820	4.627	2.228	217
<i>China_brand</i>	0.000	7.820	1.054	1.684	217
<i>Enterpri</i>	4.660	213.830	50.826	44.028	217
<i>Innovate</i>	0.540	87.090	14.688	18.397	217
<i>Market</i>	-0.300	9.950	5.949	2.055	155
<i>Latitude</i>	20.020	45.440	33.165	6.550	217
<i>Ocean</i>	1.100	2561.300	595.448	577.130	217

表 3：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i>Pcgdp</i>	<i>China_brand</i>	<i>Enterpri</i>	<i>Innovate</i>	<i>Market</i>	<i>Latitude</i>	<i>Ocean</i>	<i>Resource</i>	<i>Transport</i>
<i>Pcgdp</i>	1.000	0.404	0.686	0.684	0.603	-0.020	-0.224	-0.177	0.026
<i>China_brand</i>	0.404	1.000	0.544	0.459	0.372	0.045	-0.184	-0.220	0.100
<i>Enterpri</i>	0.686	0.544	1.000	0.736	0.573	-0.083	-0.161	-0.243	0.048
<i>Innovate</i>	0.684	0.459	0.736	1.000	0.606	-0.246	-0.341	-0.314	0.001
<i>Market</i>	0.603	0.372	0.573	0.606	1.000	-0.098	-0.197	-0.213	0.072
<i>Latitude</i>	-0.020	0.045	-0.083	-0.246	-0.098	1.000	0.286	0.248	-0.206
<i>Ocean</i>	-0.224	-0.184	-0.161	-0.341	-0.197	0.286	1.000	0.177	0.069
<i>Resource</i>	-0.177	-0.220	-0.243	-0.314	-0.213	0.248	0.177	1.000	-0.102
<i>Transport</i>	0.026	0.100	0.048	0.001	0.072	-0.206	0.069	-0.102	1.000

### （三）计量模型的设定

实证检验首先验证了假说 1 的第一部分，即：各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绩

效。检验模型设定为模型（1）。模型（1）中的  $Pcgdp$  为各城市的人均 GDP， $China\_brand$  为各城市的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 $Control$  为包括地理纬度、距海岸距离、自然资源、道路密度以及时间、空间虚拟变量在内的控制变量向量组合。

$$Pcgdp_{it} = c * China\_brand_{it} + d * Control_{it} + e_1 \quad (1)$$

为检验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绩效影响机制（假说 1 的第二部分和假说 2），本文引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方法，分别检验了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以及市场化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等（2004，2005）、钱雪松等（2015）、潘彬等（2017）等文献，具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检验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对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的显著性，如模型（1）；其次，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分别对两个中介变量及两个中介变量交叉项影响的显著性，检验模型如模型（2）、（3）和（4）；最后，以核心解释变量、两个中介变量及两个中介变量交叉项，同时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模型（5）。模型中的  $Enterpri$  为创业密度（人均创业企业）， $Innovate$  为创新能力（人均专利申请）。

$$Enterpri_{it} = a_1 * China\_brand_{it} + d * Control_{it} + e_2 \quad (2)$$

$$Innovate_{it} = a_2 * China\_brand_{it} + d * Control_{it} + e_3 \quad (3)$$

$$Enterpri_{it} * Innovate_{it} = a_3 * China\_brand_{it} + d * Control_{it} + e_4 \quad (4)$$

$$Pcgdp_{it} = c' * China\_brand_{it} + b_1 * Enterpri_{it} + b_2 * Innovate_{it} + b_3 * (Enterpri_{it} * Innovate_{it}) + d * Control_{it} + e_5 \quad (5)$$

调节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等（2005）、杨洋等（2015）的研究方法，具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以调节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模型如模型（6）；其次，增加调节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进行回归，检验模型如模型（7）。模型中  $Market$  为各城市的市场化进程。

$$Pcgdp_{it} = m_1 * China\_brand_{it} + n_1 * Market_{it} + r * Control_{it} + e_6 \quad (6)$$

$$Pcgdp_{it} = g + m_2 * China\_brand_{it} + n_2 * Market_{it} + q * (China\_brand_{it} * Market_{it}) + r * Control_{it} + e_7 \quad (7)$$

## 四、实证检验结果

### （一）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经济绩效检验

基于模型（1）进行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表 4 报告了估计的结果。其中，第（1）、（2）、（3）和（4）列是以 2010–2016 年城市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在这四组回归分析中，第（2）列加入了地理纬度、距海岸的距离、自然资源和道路密度作为控制变量，第（3）列加入了年份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年份数据的回归差异，第（4）列加入了空间控制变量，以控制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各城市的差异影响。检验结果显示：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对城市的人均 GDP 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置信水平均达到 1%），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变化较小（分别为 0.259、0.223、0.228 和 0.208），且一直处于 1% 的置信水平。第（5）列报告了单独使用 2016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第（6）列报告了基于 2010–2016 年省级样本组的回归结果，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对人均 GDP 的影响同样正向显著，从影响程度上看，2016 年的影响比 2010–2016 年的平均影响更大，省级样本的影响比城市样本的影响程度更大。回归结果也报告了地理纬度和道路密度对人均 GDP 显著的正向影响，距海岸的距离对人均 GDP 的显著负向影响，这些结论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此外，自然资源的影响不显著，这也印证了学界关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争议。

表 4 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绩效的检验结果（因变量： $Average\_gdp$ ）

	2010-2016 城市样本				2016 城市样本	2010-2016 省级样本
	(1)	(2)	(3)	(4)	(5)	(6)
<i>China_ brand</i>	0.259*** (0.022)	0.223*** (0.023)	0.228*** (0.022)	0.208*** (0.021)	0.387*** (0.062)	0.461*** (0.038)
<i>Latitude</i>		0.115*** (0.023)	0.112*** (0.023)	0.109*** (0.029)	0.153* (0.082)	0.269*** (0.042)
<i>Ocean</i>		-0.100*** (0.023)	-0.099*** (0.023)	0.023 (0.032)	-0.043 (0.089)	-0.205*** (0.050)
<i>Resource</i>		-0.030 (0.047)	-0.030*** (0.045)	0.025 (0.044)	-0.110 (0.123)	
<i>Transport</i>		0.090*** (0.022)	0.065*** (0.022)	0.055*** (0.021)	0.004 (0.024)	
<i>Space dummy</i>				yes	yes	yes
<i>Year dummy</i>			yes	yes		yes
常数 C	-0.001 (0.022)	0.011 (0.029)	-0.410*** (0.058)	-0.523*** (0.073)	0.242 (0.151)	-0.740*** (0.097)
F 值	140.549	35.576	29.394	33.175	13.536	75.922
N	1960	1960	1960	1960	280	217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二) 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表 4 的结果已经表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可以依次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基于模型 (2) - (5)，以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表 5 报告了实证检验的结果。第 (1)、(3)、(5)、(7) 列是以城市样本为研究对象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 (1) 列和第 (3) 的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城市的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 (5) 列表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城市的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的交叉项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创业“密度”与创新能力可能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可以继续进行中中介效应的下一步检验；第 (7) 列的检验结果表明，创业“密度”、创新能力及其交叉项在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对人均 GDP 进行回归时，创业“密度”与创新能力依然在 1%的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估计系数也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这一结果说明创业“密度”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但不是完全的中介效应。第 (2)、(4)、(6)、(8) 列是以省级样本为研究对象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城市的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及其两者的交叉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密度”、创新能力及其交叉项在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对人均 GDP 进行回归时，创业“密度”、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在省级样本的检验中，创业“密度”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

综合来看，无论是城市样本，还是省级样本，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在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过程中，存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城市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机制，以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非常显著，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1。这一检验结果与李宏彬等 (2009) 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尽管实证研究的角度显著

不同。中介效应的结果也表明，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并非发挥着完全的中介效应，而是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在影响机制中也存在其他未被考虑到的中介因素，但创新能力和创业“密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企业家精神包含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理论内涵，也体现在经济发展特征事实上，企业家精神历史文化比较繁荣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城市，其创新能力更强和创业氛围更为浓郁，经济发展水平也更高。企业家精神历史文化繁荣是地区发展的宝贵历史财富，但不必然能发挥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如：济南、哈尔滨、遵义等城市。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是否能发挥出经济绩效，需要给企业家创造优质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到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

表 5 影响机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i>Innovate</i>		<i>Enterpri</i>		<i>Enterpri* Innovate</i>		<i>Average_gdp</i>	
	城市	省级	城市	省级	城市	省级	城市	省级
样本组	(1)	(2)	(3)	(4)	(5)	(6)	(7)	(8)
<i>Innovate</i>							0.409*** (0.029)	0.238*** (0.067)
<i>Enterpri</i>							0.677*** (0.042)	0.280*** (0.060)
<i>China_brand</i>	0.362*** (0.019)	0.345*** (0.055)	0.472*** (0.019)	0.488*** (0.047)	0.330*** (0.021)	0.386*** (0.073)	-0.110*** (0.023)	0.268*** (0.037)
<i>Latitude</i>	-0.080** (0.025)	-0.005 (0.061)	-0.111*** (0.026)	0.085 (0.053)	-0.110*** (0.029)	0.173** (0.081)	0.167*** (0.025)	0.259*** (0.034)
<i>Ocean</i>	0.056** (0.028)	-0.044 (0.072)	0.156*** (0.029)	-0.119* (0.062)	0.082*** (0.032)	-0.052 (0.095)	-0.064** (0.029)	-0.167*** (0.040)
<i>Resource</i>	-0.177** (0.038)		-0.101** (0.040)		-0.058 (0.044)		0.141*** (0.039)	
<i>Transport</i>	0.028 (0.018)		0.083*** (0.019)		0.063*** (0.021)		0.016 (0.018)	
<i>Enterpri* Innovate</i>							-0.450*** (0.042)	-0.050*** (0.033)
<i>Space dumm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 dumm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 C	-0.542** (0.063)	-0.702*** (0.142)	-0.402*** (0.065)	-0.544*** (0.122)	-0.350*** (0.072)	-0.238 (0.187)	-0.191*** (0.065)	-0.425*** (0.082)
Adjust R <sup>2</sup>	0.392	0.590	0.358	0.696	0.214	0.287	0.381	0.879
F 值	90.986	26.883	79.106	42.288	39.169	8.232	71.829	105.188
N	1960	217	1960	217	1960	217	1960	217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2.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及检验结果

基于模型（6）和（7），以市场化为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报告如表 6。第（1）列与第（2）列是以城市样本为研究对象的估计结果，第（2）列与第（1）列相比，增加了市场化与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交叉项的影响为正向，且非常显著，同时，第（2）列比第（1）列的 R 方大 0.023，说明拟合度也有所提高，这些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3）、（4）列报告了省级样本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市场化与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为正，置信水平为 1%，且第（4）列的 R 方比第（3）列增加 0.11，这说明省级样本的市场化调节效应也非常显著。

综上，城市样本和省级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市场化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发挥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实证上支持了上文提出的假说 2。同时，检验结果也与鲍莫尔等（1990）关于制度影响企业家精神经济绩效的理论预期保持一致。从发展现实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经营和创新活动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的空间非常狭小。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逐步呈现出日益显著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更为完善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等方面。

表 6 影响机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i>Average_gdp</i>				
	城市样本		省级样本	
	(1)	(2)	(3)	(4)
<i>China_brand</i>	0.114*** (0.021)	0.070*** (0.021)	0.393*** (0.041)	-0.707** (0.330)
<i>Market</i>	0.353*** (0.021)	0.288*** (0.023)	0.355*** (0.057)	0.308*** (0.057)
<i>Latitude</i>	0.142*** (0.027)	0.156*** (0.027)	0.286*** (0.043)	0.328*** (0.044)
<i>Ocean</i>	-0.001 (0.030)	-0.012 (0.030)	-0.039 (0.059)	-0.094 (0.060)
<i>Resource</i>	0.075* (0.042)	0.077* (0.041)		
<i>Transport</i>	0.030 (0.020)	0.023 (0.019)		
<i>China_brand* Market</i>		0.185*** (0.023)		1.118*** (0.334)
<i>Space dummy</i>	yes	yes	yes	yes
<i>Year dummy</i>	yes	yes	yes	yes
常数 C	-0.353*** (0.069)	-0.319*** (0.068)	-0.434*** (0.095)	-0.336*** (0.094)
Adjust R <sup>2</sup>	0.286	0.309	0.854	0.964
F 值	53.198	55.695	82.846	82.316
N	1960	1960	155	155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在上文的实证分析中已经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验证：一是为消除单期数据波动性所带来的回归偏误，本文在考察了 2016 年的截面数据的基础上，把时期拓展到 2010-2016 年的数据，并加入年份 dummy 以控制不同年份的影响差异；二是在回归分析中针对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本文均加入了控制变量，以控制自然、地理、交通、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三是实证分析不仅检验了城市样本数据，还检验了省级样本数据，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说在不同层次的空间样本选择上的稳健性。

在内生性方面，由于中华老字号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而流传下来的企业字号，与 2010-2016 年的经济发展数据的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小，而创业“密度”、创新能力和市场化

的指标数据可能和人均 GDP 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为消除内生性问题的担忧，本文采用自变量滞后两期的回归方法对省级样本进行再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7。表 7 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创业“密度”、创新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发挥经济绩效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以及市场化所发挥的调节效应，都依然表现出很高的显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内生性问题的担忧，实证结论较为稳健。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i>Average_gdp</i>				
	经济绩效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1)	(2)	(3)	(4)
<i>Innovate</i>		0.394*** (0.114)		-0.353*** (0.105)
<i>Enterpri</i>		0.291*** (0.094)		
<i>Enterpri*Innovate</i>		-0.084 (0.064)		
<i>China_brand</i>	0.483*** (0.047)	0.225*** (0.054)	0.401*** (0.043)	-0.646* (0.355)
<i>Market</i>			0.408*** (0.062)	0.363*** (0.062)
<i>China_brand* Market</i>				1.081*** (0.363)
<i>Latitude</i>	0.272*** (0.053)	0.264*** (0.043)	0.249*** (0.047)	
<i>Ocean</i>	-0.211*** (0.063)	-0.177*** (0.050)	0.003 (0.064)	0.289*** (0.048)
<i>Space dummy</i>	yes	yes	yes	yes
<i>Year dummy</i>	yes	yes	yes	yes
常数 C	-0.284** (0.111)	0.107 (0.097)	-0.077 (0.102)	-0.004 (0.103)
Adjust R <sup>2</sup>	0.786	0.867	0.835	0.843
F 值	57.549	78.055	71.744	70.108
N	155	155	155	155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人均 GDP 数据为 2012-2016，其余变量数据为 2010-2014。

##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华老字号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了中国各地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并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传承机制，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文化传承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构建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中介变量（创业‘密度’、创新能力）—调节变量（市场化）—经济绩效”的假说。实证研究分别以 280 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样本和 31 个省级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0-2016 年的数据依次进行了经济绩效、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研究表明：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对地区人均 GDP 的影响非常显著（置信水平平均达到 1%），说明企业家精

神历史传承具有显著的经济绩效；创业‘密度’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都非常显著，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市场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也非常显著，在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影响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省级样本与城市样本的检验结果保持一致，拓展时间窗口、加入控制变量或以自变量滞后两期进行回归，实证结果都十分稳健。

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激发、传承、保护企业家精神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本文的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视角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的经济绩效及其传导机制，为新时代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更好的发挥企业家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依据。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厚植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文化土壤，加快培育企业家精神，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对于一些企业家精神历史文化较为薄弱的地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或者非正式制度，不仅体现在企业家的经商理念和价值观上，更体现在全社会对商人和经商活动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加快形成企业家顾问机制，吸收优秀的企业家参与政府的规划、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和媒体应协同引导、营造全社会的“尊商”文化，给予企业家更高的社会名誉和地位，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理念。

第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家精神迸发和繁荣的关键。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因素，市场经济制度更为完善的城市或地区，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反之亦然。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制度，既要从法律地位上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消除在资源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门槛和差别待遇；又要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推进政府权力法定化、清单化，给予企业家宽松、自由的营商环境，减少企业家寻租、处理政府关系等非生产性活动，提高企业家创新、创业等生产性活动时间，从而更大的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

第三，完善创新创业的制度支撑体系，为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创造基础条件。企业是企业家精神焕发的载体，创新和创业活动是企业家精神的呈现形式，企业家精神历史文化繁荣是地区发展的宝贵历史财富，但不必然能发挥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绩效，企业家精神的激活需要给企业家创造优质的创新创业环境，从制度上推动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开放科技资源、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完善创业保险、担保和风险分担制度，构建创新创业容错机制，以更好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 **参考文献：**

- 程锐，2016：《市场化进程、企业家精神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学家》第8期。
- 陈忠卫 李晶，2005：《内部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第1期。
- 陈逢文 张沁怡 王鲜云，2018：《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2期。
- 戴维·兰德斯 乔尔·默克 威廉·鲍莫尔，2016：《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中信出版社。
- 董志强 魏下海 汤灿晴，2012：《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
- 方颖 赵扬，2011：《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第5期。
- 冯筱才，2003：《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2011：《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第9期。

高波, 2007:《文化、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区域差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胡永刚 石崇, 2016:《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

蒋春燕 赵曙明, 2006:《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 2009:《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0期。

李新春 苏琦 董文卓, 2006:《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经济研究》第2期。

李新春 何轩 陈文婷, 2008:《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传承——基于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刘鹏程 李磊 王小洁, 2013:《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欧雪银, 2009:《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第8期。

潘彬 金雯雯, 2017:《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经济研究》第8期。

钱雪松 杜立 马文涛, 2015:《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管理世界》第11期。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第5期。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第2期。

魏下海 董志强 张永璟, 2015:《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自民营企业家“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经济科学》第6期。

吴晓亮, 2003:《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战线》第2期。

邢源源 陶怡然 李广宇, 2017:《威廉·鲍莫尔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贡献》,《经济学动态》第5期。

韦倩 王安 王杰, 2014:《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市场的力量》,《经济研究》第8期。

杨洋 魏江 罗来军, 2015:《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管理世界》第1期。

庄子银, 2003:《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经济研究》第1期。

Acemoglu, D. et al(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1401.

Andersson, M. & S.Koster(2011), “Sources of persistence in regional startup rates: Evidence from Swede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 (1): 179-201.

Audretsch, D.B. & M.Keilbach (2004),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Regional Studies* 38(8): 949-959.

Baumol, W.J.(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893-921.

Decker, R. et al(2014),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dynam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3): 3-24.

Glaeser, E.L. et al(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2): 498-520.

Samila, S. & O.Sorenson (2011), “Venture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1): 338-349.

Stuetzer, M. et al (2015), “Industry structure, entrepreneurship, and cul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istorical coalfields”, MPRA Paper, No.67425.

Tsvetkova, A.(2015),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etropolit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9 (4): 299-316.

Wyrwich, M. (2012),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heritage in a socialist and a post-socialist economy”, *Economic Geography* 88(4): 423-445.

###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MA Zhongxin      TAO Yitao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 Time-honored Brand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uses the methods of mediating effect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inherita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inherita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 capita GDP; the entrepreneurial 'density' and the innovating ability have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in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marketization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Mediating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